

历史之谜

(二)

黄兵明 主编

北京银冠电子出版有限公司

目 录

揭开淇澳岛的历史之谜.....	1
50年代周恩来险些辞职.....	4
历代汉字知多少.....	2 0
确实的存在——海底人鱼.....	2 0
比利时空军捕捉飞碟目标.....	2 4
苏军突袭 UFO 基地活捉一外星人.....	3 2
德黑兰夜空上的飞碟.....	3 3
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	3 6
外蒙独立始末.....	3 7
天地会为何叫“洪门”？.....	4 3
肯尼迪遇刺案一个永远的谜.....	4 4
奇特的古罗马花节.....	4 6
广东仙、佛真身探秘.....	4 8
徐志摩身后一个尚未解开的谜.....	5 5
古代灾难是从天而降的吗？.....	5 8
星星透露了金字塔年代.....	6 0
埃及金字塔之谜的惊人新说.....	6 2
紫禁城里的太监.....	6 4
古老而时髦的深蓝色.....	6 8
消失了的神秘马雅王陵.....	7 2
中国南方的长城.....	7 4
人死后真的有灵魂？.....	7 6
与野人搏斗第一人.....	7 7

揭开古老地球形成的奥妙.....	8 2
神秘的雕像.....	8 6

揭开淇澳岛的历史之谜

珠海市淇澳岛位于珠江口伶仃洋上。岛上有一条长达一千多米的花岗岩条石铺成的白石街和一个土炮台。据当地民间传说，这与鸦片战争前淇澳村居民抵抗英国人的武装入侵有关，而白石街是用侵略者的赔款修筑的。但是，由于缺乏文献记载，关于这场反侵略斗争的年代、起因、组织者、经过等等，有多种传说，让人疑窦丛生，莫衷一是。

2000年春，蒋秋霞、韦 等 20 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提案，建议将淇澳岛白石街列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了慎重起见，珠海市委和市政府决定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对这段历史进行考证。夏天，接到珠海方面的通知后，我查阅了中外几十种有关的著作和资料书，皆未发现淇澳村居民反侵略斗争的记载。9月，我到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时，在英国外交部档案 F·O·1048 东印度公司中文档中，发现了与此事有关的、已尘封 160 多年的 22 件原始档案，令人喜出望外。

其中，《两广总督卢坤致洋商谕令》等原始文件证实了鸦片战争前淇澳居民反侵略斗争的传说，使我们首次了解到事情的真相：1833年10月13日（道光十三年九月初一）中午，淇澳村民苏上品等四人正在

金星山脚港口捕鱼，听到同村郭亚祥叫喊“夷人偷牛”。他们上岸看见外国人将牛拉走，便将偷牛人抓获。该村地保认为偷牛的是外国人，不能送官，让他们将其送回。当日申牌时分，有 50 多个外国人到村内寻衅打架，村民一起出来驱赶。外国人见村民人数众多，慌忙逃走。其中一人落在后面，用剑和鸟枪对付追赶的村民，后被苏上品用刀刺伤肚腹，倒地死亡。其余外国人在逃跑途中，见华人郭名秋和工人黄亚仰在田间工作，便将郭名秋绑架上船。黄亚仰叫喊，被他们放枪打伤，后因伤重医治无效死亡。10 月 15 日（九月初三），船主马基率领许多外国人乘坐舢板十余只，驶到淇澳村前，向该村开枪开炮。

他们还向防夷千总倪应龙说：“此村不肯顺从，应即覆其巢。”当天，村民孙亚福正在村前海面捕鱼，因躲避不及，被他们用鸟枪打伤。清朝地方政府闻讯立即派兵到该村驻扎防卫，两广总督、澳门同知、香山县令等先后向英国大班发出谕令，要求他们释放郭名秋，交出凶手，并不许外国舢板进内洋滋事。美国人马士在 20 世纪 20 年代著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书对此事也有记载，英国船长格兰特在报告中谎称事情是一名华人偷窃外国破船的铜铁引起的。但他承认他曾号召外国武装驳艇进攻淇澳，并说

外国艇队到达淇澳时，曾遭到当地居民火炮射击。1833年10月的淇澳村事件是鸦片战争前中国居民一次较大规模的自发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虽然其规模比广州三元里居民抗英斗争小，但时间要早8年，在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

淇澳村事件发生并不是偶然的。鸦片战争前，大量外国鸦片走私船停泊在淇澳岛濒临的金星门海域，使金星门成为鸦片走私的基地。

外国鸦片贩子经常对淇澳岛进行骚扰，侵犯中国主权、危害当地居民安危的事情时有发生。东印度公司中文档中就有不少事例。1833年8月17日，英国鸦片贩子以淇澳一名华人偷盗受损商船物资为由，将其监禁在停泊在金星门的威臣船上，破坏了中国的司法自主权。澳门同知因此要求英国大班将人犯释放，以便按中国律例审判。又如，1833年9月7日，华人黄亚秀父子三人出海贩鱼，路过停泊在金星门的威臣船时，该船外国人强买，彼此发生争执，外国人竟将黄亚秀推入海中，使其溺水淹毙。而当年10月进攻淇澳村的武装艇队就是外国鸦片贩子组织的。因此，1833年的淇澳村事件客观上也可以说是中国居民反对外国鸦片走私的斗争。

2000年10月，在珠海市政府召开的《淇澳白石

街与鸦片战争》研讨会上，我公布了从英国带回的淇澳居民反侵略斗争的档案。鉴于 1833 年这场斗争在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文天祥曾在伶仃洋写下著名的爱国诗篇《过伶仃洋》，鉴于淇澳岛至今仍保留着著名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的故居，与会 10 余名专家、学者建议将整个淇澳岛作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关于 1836 年淇澳是否发生过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关于利用鸦片贩子赔款修筑白石街一事，至今尚未找到文字资料加以确认。淇澳岛上发现的几块外国人墓碑与淇澳居民反侵略斗争究竟有无关系，也待研究。希望史学界同行共同努力，进一步揭开淇澳岛的历史之谜。

50 年代周恩来险些辞职

由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发展到“大跃进”，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历史演绎了一场场难以捉摸的风云。所幸的是，经过“大跃进”的阵痛，系铃的人出来解铃。1960 年 6 月 18 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了一篇名为《十年总结》的文章。在讲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中出现的“乱子”时，毛泽东讲了这样几句话：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

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这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的承认错误的方式。

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还婉转地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受到的严厉批评有限度地平了反：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反冒进思路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头脑中急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主观意识再次强烈起来。

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首先要统一的，就是领导层中的认识。

在毛泽东看来，要统一认识，前一段的反冒进是一个大的障碍。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作了以《做革命的促进派》为题的动人

心魄的讲话。

毛泽东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响亮的口号，并总结和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这无疑是为求实、慎重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然而这时的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仍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极不满意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可见在总方针上，毛泽东的意见是“促进”而不是“促退”，而且是不容置疑的。他对去年扫掉了“促

进委员会”和“促进”性质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很不满意，在讲话中他把这件事的严重性提得很高：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有办法。

毛泽东又把这件事与反右派联系起来，说：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此言一出，谁还敢继续“促退”，谁还敢说“促进”是“冒进”？况且一些人以为，只要人有胆量、有意志，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了，人们陷入了沉思。而周恩来则陷入了苦闷——一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深苦闷。

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来看，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在许多时候都是高瞻远瞩的，其正确的一面远远多于

错误的一面。他与毛泽东是多年密切合作的伙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感情深厚的朋友。然而，自从反冒进以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周恩来总感到在一些方面自己与毛泽东的思路有一些距离，或者说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

这时，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把高指标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毛泽东于11月2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其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对1956年的反冒进公开进行指责：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

也是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的豪言，则以中国“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话来回应。毛泽东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跃进。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周恩来：1956年的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面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周恩来不得不作检讨

1958年是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开始的。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社论批评“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明确“目前全国农业已

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 1958 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社论喊出的口号是：“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这时，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已陷入被批评的境地，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1 月 2 日至 4 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借谈 1958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直截了当批评说：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随后，毛泽东在召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会议时，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1 月 11 日至 22 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 12 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如：——1956 年 6 月 15 日，李先念代表国务院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 1955 年国家决算和 1956 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关于反冒

进的一段话，那里说：“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中宣部根据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意思起草的 195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周恩来 1956 年 11 月 10 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关于 1957 年度计划的报告》节录，这份报告主张：“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一下的，不然站不稳”，发展速度“可以放慢一点”，“数量上的增长稍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

……南宁会议一开始，与会者就更为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所以，会议第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单刀直入地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一吹，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是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个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

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12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来清算反冒进问题：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周恩来不在场。南宁会议开始的前两天，周恩来还在北京；11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12日，接见了三批外宾。待周13日飞抵南宁出席会议时，才亲身感受到会议空气的凝重。周也为之紧张起来。

毛泽东没有因周恩来的到来而对他有所客气，毛并不想降低批评反冒进的调子。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

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写的一篇鼓

动大跃进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严肃地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在毛泽东的直接追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继续往下说：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 100 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

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会上，康生是得彩的，柯庆施、李井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很是使人难堪的。

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 50 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

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

薄一波看出来，周恩来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转过弯来，但组织原则驱使他不得不作检讨。薄一波后来回忆：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引号。

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

在他的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

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周恩来的许多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周恩来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

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